

三十年造就《受命》

止庵：一場記憶與遺忘的抗衡



◆止庵

對於止庵自己來說，《受命》不算什麼「首部長篇小說」，更算不上是「新」作品，這部以伍子胥為模版的虛構小說，早在30年前便已成型，是一部腹中舊作，更是他將自己對於時代的情感傾瀉而出的特殊命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受命》的兩個版本，前一版只有一個尾聲，而終局版則是將最後的場景寫了出來。對止庵來說，「留白」可能是一種好的結局，但書籍出版後，除了有些人對於結局的解讀外，更有一些聲音質疑他「沒有能力」將結尾寫得飽滿，止庵笑言自己受不起「激將」，還是決定要將這個版本發表出來。

三十年磨一劍

《受命》講了一個當代復仇故事，人物聚焦在一位虛構的文學青年，口腔科醫生身上，這看上去似乎便是止庵的自我復刻，但據他的陳述，人物之所以選擇這樣一種背景，純粹因為他希望建立一個足夠真實立體的人物小傳，了解這個角色的周禮與生活，絕不是什麼自傳形式的故事。「最早我其實只想寫一個伍子胥的故事，但後來發現自己寫不了，因為這個故事要基於很多細節發生，但是古代的這些場景、習慣我都不知道，光是田野調查也不算準確。」他說。

「我個人受到張愛玲的影響比較大，」止庵解釋道，「她的大部分小說寫法都是以第三人稱去創作，但是會貼近其中一個人物。」他對近代小說普遍使用的「上帝視角」不偏好，覺得那樣的創作更像是劇本，比較「柴」，「如果用人體去形容一個文學作品，我更喜好骨實壯實的、皮相豐盈的。」他說。

而這種豐盈，則是由細節構成的。「很

多作者會用一些事件或者衝突去推進故事，但是張愛玲則不同，」止庵談到張愛玲寫《半生緣》，「前面的故事，幾乎就沒有什麼事件，都是一些細碎的生活，對話間也是日常的。」他認為這種細節的展現才是給讀者真正的畫面，也想將這種寫法接續下去。在《受命》出版之前，止庵花在田野調查上的時間長達好幾年，「過去的生活完全憑記憶來寫肯定會有很多錯，所以我就去圖書館考察、去實地看看，將當年的場景都熟悉了。書出版之後很多人對這個年代都很感興趣，因為這樣的生活太遙遠了，顯得比較有意思。這也是我花這個時間去做這種熟悉的動機。」

「文心」需時打造

止庵過往筆耕的作品以研究周作人、張愛玲等文學為主，他認為這種非虛構的寫作與小說創作很不一樣，「做研究你必須要有距離感，這種距離感是無論你對這個作家有多喜愛，也不能一味去贊同他。」而「消除距離感」則是止庵對自己創作虛構小說筆下人物的要求，這是一種與角色合二為一的體驗，要將自己變成筆下的人物，「古代有個詞叫作『文心』，這就是創作之心，這個心思我是有的。」

他以自己書中描寫的細節為例，「《受命》裏有一個重要的情節是關於哈雷彗星的，因為那個年代這是一個重要的事件。」書中的主角在家中拉開窗簾試圖觀看哈雷彗星的場景中，止庵描繪了一個

「窗台上擺放了幾隻凍柿子」的情形，他解釋道：「因為那時候很少人家裏會有冰箱，所以這個柿子一般都是放在床邊的，這樣的溫度適合保存柿子。」一個簡單的情景，便將年代感、生活氣息細緻顯露出來。

另一個值得一提的細節，他說：「男女主人公在北京坐環城的公共汽車，坐了一圈半，為什麼呢？因為當時的北京，如果一男一女要待在一起，除了吃飯就沒有別的事情可以做，沒有地方可以去。這就必須要經歷過這個生活的人才知道，而我不去寫這個東西，就會被人慢慢忘了，因為這對現代人來說是不可想像的情形。」

「應當要對得起這份經歷」

《受命》這個故事聚焦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除了止庵自身經歷過這個時代，更因為他認為八十年代非常特殊，是一個「精神與物質並重的年代」，「八十年代之前的人們其實是物質生活很缺乏的，所以根本談不上什麼娛樂、精神生活，而到了九十年代，便通通以賺錢為主了。」他對那個時代的細節記憶猶新，「其實我能寫出來的城市場景，不到百分之一，但是所有事情都得有依據，比如我想要寫女主角一遍一遍去找男主人公，我是不是可以寫她某一次是去髮廊找他呢？這樣的話就可以描寫出來當時這個行業的形態，但是這並不在故事的生活框架裏，我最終就放棄了這一段。」

此外，八十年代的特殊性對於止庵來說還有一層時代本身給予的意義，「1980年代是一個現在被大家說得很『高』的年代，其實是因為七十年代沒有完全結束，而新時代又沒有完全開始，是中間的一個過渡時期，所以才有這個故事。而我小說中的主人公是一個『向後看』的人，他覺得過去是沒有完結的，他要把過去『解決』。」他說道，「只有在那個年代才有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因為所有人都認為過去就是結束了，但他不這樣認為，這是一個復仇的故事。」

這和止庵本人的寫作意圖其實是相輔相成的——在他看來，這是一個關於記憶和遺忘的故事，「我們對那個年代已經沒有記憶了，甚至連遺忘都沒有。」他認為歷史就是發生了、記住了、遺忘了，「所以說記憶是不能不被遺忘的，因為這是個自然規律。」但是同時，止庵也對這件事有些許不甘心，「為什麼我們要有歷史呢？就是我們希望去記住一些事情。」他說道。

事實上，寫作者之所以對某個個體或時代有特別的指向性，只是擁有一個樸素的動機，如他所說，希望寫出一個記憶與遺忘之間的抗衡，「記憶會消亡於遺忘，但是它們短暫地交匯過，別的都不在我的考慮範圍之內。」

「經歷了這些事情，就不能白白經歷，否則就是浪費，我應當要對得起。」他說。

以小說家身份再訪香港書展

止庵原名王進文，北京人，是著名學者、傳記隨筆作家，其代表作有《惜別》、《畫見》、《周作人傳》、《柶下讀莊》、《神拳考》等。其作品《受命》獲選為亞洲週刊2021十大小說。

止庵被視為權威的周作人、張愛玲研究者，2016年，他就曾造訪香港書展，與宋以朗一起對談「張愛玲文學的與眾不同之處」。今年重訪書展，因疫情原因，他唯有以視訊形式現身，在周日的講座上與讀者交流。而這一次，止庵乃是以小說家的身份，帶著長篇小說《受命》，講述文學書寫如何成就「對抗遺忘的軌歌」。

《受命》的最初構思雖然早在30年前，上世紀九十年代已經將故事寫成，但真正成文卻是近幾年的事情，除卻希望自己能對細節上做到有十足把握外，止庵覺得最根本的原因是「我自己是自己最嚴苛的讀者」。

儘管故事的主人公用的是與自己經驗相似、人設相近的背景，但他否認是以自己為藍本進行創作，「這個故事完全是我編的。」他說。既然是虛構類的小說，就更要做到不心虛的狀態，這是對一個作品的負責，也是出版後不心虛的底氣。

逛書展 品故宮

吳志華 劉小康 講述故宮緣

隨着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開幕，香港掀起「故宮熱」，今年書展，各出版社也推出了不少故宮主題的書籍。日前，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吳志華與著名設計師劉小康就現身書展，在講座「中華五千年文化——紫禁城的故事」中與讀者分享自己和故宮間的緣分。

吳志華闡述對於香港故宮館策展的思考，他表示市民對於博物館主要的稱讚來自「建築氣度、國寶精品、策展心思」三方面，並認為故宮是個很好的載體去講好中國故事，而香港是個很好的平台去做另類的演繹，且能擴大觀眾群。他又指出，策展手法在於着重發掘歷史文化與現代生活之間的聯繫，及透過多媒體展品來展示歷史資訊，「文化不單單要認識，還要感受、參與及傳承」。他續指，追尋「不一樣的故宮」，其實代表了「香港似乎在尋找自己的特色，同時要與國家做出整合，正正要做到不一樣，才能體現出中國文化的『一體多元』。」

設計師劉小康則憶述他與故宮的三次「邂逅」。第一次是1978年暑假遊北京故宮，當中的九龍壁令他最為震撼，「龍的做工很精美、很生動、很有力量感」，之後北京的影像一直在他的腦中

徘徊，以至於設計2000年北京申辦奧運的海報和紐約藝術指導協會(ADC)成立80周年海報時都有用九龍壁作為參考。第二次則是2006年參觀台北故宮博物院的大觀展，印象最深刻的是其中展示的中國茶文化。最後一次則是2019年他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做形象設計，博物館的logo最初的概念來自龍袍，不斷修改後，最後成品的四方形和顏色分別來自中國古代建築的藻井和琉璃瓦。他亦將相關的形象引申至文創產品及故宮館的貴賓室「士林館」中。吳志華補充說，希望未來能將「士林館」開放給公眾，例如舉辦一些文化沙龍雅集，「藝術文化不只是專家的事情，人人都能參加。」

吳志華最後表示，在與觀眾產生連接之餘，更要將中國文化帶到世界。他認為，博物館下一步是吸引更多年輕人參觀，不能故步自封，於是邀請在場20歲以下的年輕人發言，一名觀眾表示：「展覽更加新型，及多能表達出歷史對我們生活的重要性，不要好像在看歷史課本，這樣才會讓學生和年輕人對中國文化有更多接觸。」劉小康則笑說可以從《延禧攻略》看起，而吳志華則認為未來或許能加入「清宮文化」的展廳，

將正面的信息傳遞給年輕人。

走進今年書展的展廳，會發現介紹故宮文化的書籍頗多，且大多包裝精美、圖文並茂。其中，香港商務印書館就出版了《紫禁萬象——故宮文物的故事》，此書由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及故宮博物院聯合編製，圖文並茂地介紹九十件真品。此書亦是首本通過故宮博物院的藏品來講述清朝故事的中英雙語出版物，為了避免冷冰冰地闡述文化史實而缺少生活氣息，書中每件物品的講述，都從紫禁城內特定的人物、地點或事件切入，以說故事的方式娓娓道來，由此讓讀者了解故宮的物質天華、大千世界，從中窺探中華文化的底蘊。香港商務印書館的另一套出版《故宮三寶》



◆香港商務印書館推出中英雙語版《紫禁萬象——故宮文物的故事》(Tales of the Forbidden City)。 Arthur 攝

則將《故宮·國寶》、《故宮·宮廷生活》和《故宮·宮殿》三冊合為精品套書，主編皆是赫赫有名的文化大家。其中，《故宮·國寶》由著名美學家朱光潛主編，是故宮博物院首次以畫冊形式展示國寶級文物；《故宮·宮廷生活》則是全球第一本系統介紹清代宮廷生活的大型畫冊；《故宮·宮殿》由著名古建築專家于倬雲執筆，系統而完整地展現故宮的建築理念、藝術及工藝。中華書局則帶來《大故宮》(3冊)和《故宮宮建六百年》，前者是著名歷史學家閻



◆有出版社在書展設立故宮專區，圖為中華書局展區，閻崇年的《大故宮》系列是重點叢書之一。 黎展泓 攝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吳志華(中)與著名設計師劉小康(右)出席書展講座。 黎展泓 攝

崇年的力作，後者的簡體版曾獲得「2020年度中國好書」和「文化遺產十佳圖書」榮譽。而對於想要了解故宮文化的小朋友，新雅出版社的《貓小兵故宮樂遊團知識遊戲書》系列及香港三聯書店的「我的家在紫禁城」系列都是不錯的選擇。

◆文：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黎展泓



◆書展中可見不少故宮主題書籍。 黎展泓 攝